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李扬:

双循环背景下的金融发展



一、双循环是长期战略

“双循环”理论提出时间不太久,社会各界讨论甚多,因此,我觉得要想全面理解“双循环”的深刻内涵,需要从四个方面着手。

一是要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二是要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三是新发展格局绝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四是对外开放是基本国策,我们要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我们之所以在这个时期提出“双循环”理论,是由于形势发展使然。众所周知,中国现在已经从“站起来”“富起来”,逐渐走向“强起来”。我们要建成社会主义强国,就要对标世界现有的强国。我们在与国际市场进行交流时,到底处在什么样的格局上?可以比较的有三个国家:德国、日本、美国。

数据显示,2019年,德、日、美三大国中,唯有德国对外依存度高于中国,达70.8%,这还是因为德国身处一体化程度极高的欧盟之中。同年,日本(28%)、美国(19.7%)均低于中国(35.7%)。

大国一般都不会听任其经济保持较高的对外依存度。因此,发展格局转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双循环,是中国成为真正的世界经济强国的内在要求。

十余年前,中国的进出口总额曾高达GDP的60%以上。到了2019年,对外依存度已降至35.7%。这说明,自2007年始,中国经济已经自动在调整对国际市场依赖度过高的问题。双循环战略的提出,正是延续了中国经济早已开始的调整方向。然而,对标美国,我国的对外依存度仍然过高,仍有百分之十几的空间需要压缩,因此,要实现资源配置格局及发展格局的转型需要做出较大努力。

实行“双循环”,最根本的要求不仅是要把对外依存的指标压下来,其根本要害是循环。因此,我们不要把眼光只放在几个百分比上,而是要加快循环,打通各种各样的堵点,提升国民经济体系整体效能,使经济顺畅地循环。

有四个可以观察的角度:一是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同时注重需求侧管理,供求并重。二是打通堵点,补齐短板。三是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四是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二、“一带一路”:中国的全球化战略

“一带一路”倡议的横空出世,就是在向

世界提供全球化的中国智慧。我们从五个方面看中国对于全球化的贡献:

第一,打造命运共同体。传统全球化是发达经济体将其国内的体制和规则强行推向世界其他国家。推进过程是规则先行,强令接受和执行。形成中心/外围框架,占据价值链有利位置,对广大外国国家进行价值汲取,实现自身国家利益最大化。而中国正在推进的全球化,则是在承认世界多元的前提下,努力在趋同和多元之间找到平衡。确认各国一律平等,追求包容性与发展的可持续性,力求使各个国家共享全球化的收益。这种全球化,致力于推动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合作共赢,打造命运共同体。

第二,加强区域间的经济合作。传统全球化追求的是某种趋同性,最近几年的“去全球化”危机,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因为被发达经济体强势推动的“趋同化”冲击了世界的多元结构,损伤了其背后的多元利益。而“一带一路”体现的全球化则承认差别,承认多元,并致力于寻找趋同于多元的协调。

第三,基础设施建设先行。在未来的全球经济发展中,积极推进基础设施建设,为经济的全面发展奠定基础,已成当务之急。“一带一路”倡议正是将基础设施建设置于优先地位的全球化战略,它致力于推进世界建设基础设施,因而是夯实基础、雪中送炭的全球化。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发展行之有效的经验,能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有益参考。

第四,提供了发展导向。“一带一路”倡议致力于推进参与国家的产能合作,因而是推进各国实现工业化,满足最广大劳动大众最基本生活需求的全球化,是帮助参与国解决贫困问题的全球化。中国发展过程中的若干成功经验和做法,可以为“一带一路”国家提供借鉴,例如,以义乌为代表的小商品平台交易模式,以阿里、腾讯、京东等为代表的线上交易和支付模式,以经济开发区为代表的区域开发模式等等,都可为“一带一路”国家直接借鉴。

第五,包容发展。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推动的全球化,强调的是包容性与可持续发展。应当看到,人类社会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以后,对于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将给予越来越多的重视,更多地追求以人为中心,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追求包括GDP增长指数、人类发展指数、社会发展指数、社会福利指数、幸福指数在内的全面发展;追求各类国家、各个地区发展,真正共享全球化收益;追求可持续发展,更加兼顾环境的可持续性,比如气候变化等,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不致因为我们这些前辈透支了环境和资源,在地球上无法幸福地生产和生活。

我们推行的是中国特色的全球化战略,而为了推动“一带一路”倡议扎实深入发展,我们必须借鉴发达经济体的成功经验,在体制机制建设上做好功课。其中最重要者,首推完善区域公共品的供给机制。我们以为,在“一带一路”倡议已被包括若干发达经济体在内的越来越多国家欢迎和接受时,

提供区域公共品的任务必须迅速提上议事日程。

随着全球化的健康推进,需要提供全球公共品,区域合作的发展,同样也需要供给区域公共品。我们若致力于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来推进经济全球化,就必须承担提供区域公共品的责任。

提供区域公共品的战略,必须同国内完善公共品供给机制密切结合起来,在这个意义上,提供区域公共品,需要大力推动国内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三、双循环格局下的金融改革

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中国金融机构的规模扩张很快,金融实力提高迅速。但是,在结构上,中国以银行为主的金融机构体系,固然有利于迅速聚集金融资源,从事大规模投资和“办大事”,但也存在严重弊端:一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能力不足,二是支持创新能力不足,三是资本市场上机构投资者严重缺口。

因此,下一步,金融机构改革应对标解决人口老龄化、支持创新发展、资本市场发展,以及应对全球债务泛滥和长期超低利率/负利率的挑战。所以在金融机构方面,我觉得有五个改革是很重要的:

第一,推动金融机构多元化。需从几个方面着手,一是深化商业银行改革,加速商业银行向服务业转型,减少对息差的过度依赖,稳步推动商业银行向混业经营转型;二是推动养老机制改革;三是大力发展保险业;四是鼓励投资银行、各类基金、信托、VC、PE、金融租赁等非银行金融中介机构发展;五是继续完成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健全商业性金融、开发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分工合理、相互补充的金融体系”的任务。

第二,发展中国特色资本市场。中国高速增长所需的巨量资本,四十余年来主要是由商业银行提供的,这显然是与教科书不尽相符的“中国特色”之一。多年来的成功实践告诉我们,在中国发展资本市场,必须摒弃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非此即彼的“两分法”,认真探讨银行机构有效参与资本形成和资本交易的路径。

金融机构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可能是中国资本市场的特色之一。因此,要进一步发挥中国资本市场的这一特色,对于金融机构,特别是银行类金融机构的管制就必须放松,就应当允许甚至鼓励银行打开资产负债表,让它们的资产业务和负债业务与金融市

场深度融合并协同发展。应当稳步推动商业银行向混业经营转型。同时,还要发展各类非银行金融机构及各类资产管理业务。

第三,要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百年未遇之大变局和百年未遇之大疫情凸显了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性。中国要在世界上成为经济强国,必须拥有对国际货币体系产生重大影响的世界货币。

一国货币的国际地位,主要表现在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市场中作为价格标准、支付清算工具、避险工具和价值储藏工具等领域发挥的作用上。近年来,资产的安全性对于成就一国货币之国际地位的作用突出。

在国际债务市场、外汇交易、全球支付和外汇储备四大领域中,人民币的占比均呈现出较强的增长势头,但由于起点过低,人民币至今仍处于国际货币的边缘地带。

人民币国际化是个大尺度进程,因此,上述局面短期难以改变。尽管如此,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发展安全、高效率的债券市场,积极推动非居民购买并持有人民币定值金融资产,居于重要地位。

第四,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金融基础设施在金融体系和更广泛的经济活动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保证金融效率和金融稳定的基础,是保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基础。

第五,金融科技发展决定金融业未来竞争力。金融科技是技术驱动的金融创新,旨在运用现代科技成果改造或创新金融产品、经营模式、业务流程等,推动金融发展提质增效。而金融业历来就是科技运用的主要领域。运用金融科技改造传统金融,是金融发展的基本途径。因此,金融科技发展的状况如何,决定了一国、一地金融体系未来的竞争力。

按金融科技企业数排名,2019年,中国在上居第三位。美国、英国位居中国之前,这充分说明,我国金融科技发展必须在底层科学技术和制度体系保障上做更大努力。否则,我们还会重蹈在一般商品和服务领域中的覆辙,还会在全球金融发展和创新上居于被动的“接受者”地位。

中国正面临着一个百年未遇之大变局,为了应对全球的变化,我们提出了“一带一路”的构想,而要实现这样一个宏大的目标,需要包括金融领域在内的各个领域都做出改革。目前,任务都已提出来了,相信在党中央领导下,我们在多个方面都能够取得行稳而致远的发展。

(本文根据李扬在第七届“一带一路”园区建设国际合作峰会暨第七次全国企业营商环境研讨会上的主题演讲整理,有删节)

